

●纪念孙犁先生诞辰110周年

# 梧桐高矗凤自来(上)

耿传明

今年是孙犁先生诞辰110周年。孙犁先生2002年离世,至今也有二十一年了,但有个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:他非但没有因离开人间而被人们忽略、遗忘,反而在他离去之后形成了一个关于他的隐性的出版热点。据统计,近年来各类出版发行的他的著述高达二百多种。就当下的文学出版来说,这是一个很高的数目,这说明他是一位真正靠着自己的作品赢得市场和读者的作家。这位一辈子自甘寂寞、乐居边缘的作家,为何在他去世多年后迎来“高光时刻”?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。我抛砖引玉,试着回答这个问题,我认为答案可主要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:

首先是站位高,也就是站得高、看得远,孙犁对于文学的本质、特性,有准确而深刻的认识和理解。孙犁在《方纪散文集·序》中这样谈到他和方纪的共同之处:“我们都是爱好文学艺术,从而走进革命的队伍。这可以说为革命而文学,也可以说是为文学而革命。”这种革命

与文学的统一也就是美与善的统一,而美与善恰恰是构成文学艺术的最为核心的质素。可以说,它所代表的就是文学艺术的含金量,决定了其内在品质的高低。美是什么?按照阿奎那的说法:“美是让人看得到的赏心悦目”,而善则意味着视人如己之道。而这种让人看得见的赏心悦目、视人如己的境界,在一般文学作品并不那么容易达到,但在孙犁的作品中却给我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:像《荷花淀》里柔情似水而又乐观坚韧的水生嫂、《琴和箫》中美好俊气的两姐妹、《吴召儿》里像只小山羊一样在山间奔跑的吴召儿、《风云初纪》中那位为国捐躯的清秀聪慧的女县长、《铁木前传》里那位美貌热情而又泼辣任性的小满……这些人物形象都是极为鲜明的。人物形象是文学的终端产品,也是创作成败的关键,孙犁塑造出这么多鲜活生动而又清新隽永、优美动人的人物形象,正标志着他对现代文学的独特而卓越的贡献。

对于孙犁来说,对他一

生吸引最大的,就是抗日战争中在中国老百姓身上所表现出的那种美与善的极致。这种美与善的极致,既是革命也是文学所追求的理想和目标。正是由于这种对美与善的钟情,才使得孙犁不会偏离投身革命的本心,不会遗忘热爱文学的初衷。战争时代对于文学最大的诱惑,就是绝对的功利化诉求和泛政治化的庸俗社会学——对于美与善的信仰和守护,使孙犁避免了这两个文学的“陷阱”。这正是其在文学本体论上站得高、看得远的具体体现。

其次是心性纯,孙犁成为文学大师的一大原因在于他心灵的纯净无瑕、光可鉴人。他在《在阜平》一文中这样写道:“真正的历史,是血写的书,抗日战争也是如此。真诚的回忆,将是明月的照临,清风的吹拂,它不容有迷雾和沙尘的干扰。面对祖国的伟大河山,循迹我们漫长的征途:我们无愧于党的原则和党的领导吗?无愧于这一带的土地和人民对我们的支援吗?无愧于同志、

朋友和伙伴们在战斗中形成的情谊吗?”应该说,孙犁所追求的这种对于理想的真诚在现实中是罕见的,他达到了一种宗教性的神圣境界。正如《中庸》中说:“诚者,天之道也;诚之者,人之道也。”这是庄子说的“以天合天”的追求,也是儒道释所谓复性、回心、返璞归真的奥义所在。国学大师钱穆认为,“诚”有四个层面,也就是说,要做到“诚”须有四步功夫,即:言行合一、人我合一、物我合一、天人合一,我认为孙犁的一生接近或已达到了这样的目标。他是类似于庄子所谓的“畸人者,畸于人而侔于天”的人物,与世俗违和、碰撞但却与天道相通、相与。所以,读孙犁的书给人一种以清澈透明,心意畅达之感,正如唐代常建《题破山寺后禅院》诗中所说“山光悦鸟性,潭影空人心”,具有一种让人明心见性的功用。孙犁的著述达到了一种“秋水文章不染尘”的境界,这是现代文学史上很少有人达到的境界。

孙犁的书也是我的个人偏爱,是我的案头之书、枕边之书。读他的书,令我想起宋人的一首参禅诗:“我有明珠一颗,久被尘劳封锁。而今尘尽光生,照破青山万朵。”孙犁正是这样一颗明珠,能让人的心灵涤掉尘劳的染污,回归本有的清静与自在。

春夏时节,在天津的道路、公园、居民小区,一排排平整低矮的灌木由青转绿,犹如水洗一般油光发亮,萌发勃勃的生机。人们习惯将这些灌木统称为“冬青”。其实它学名叫“冬青卫矛”,又名“大叶黄杨”。名叫“冬青”的植物是另外一种四季常青的野生乔木,近年来在津门亦有种植。

冬青卫矛是卫矛科、卫矛属的灌木,原产于日本南部,后来引入中国。它枝短叶绿,叶片稍厚,耐旱耐寒,经冬不凋。因耐生长、耐修剪、茂盛健壮,常做绿篱使用,或修剪成圆球等形状,装饰草坪绿化环境。园林工人简称它黄杨。有诗写道:“咫尺黄杨树,婆娑枝千重,叶深圃翡翠,据古踞虬龙。”赞赏它虽矮小却翠绿茂密,润目养眼。这些年,适应城市大规模绿化需要,这一常绿灌木在天津得到广泛栽植。无论道路、街巷、公园、社区、庭院,处处可见冬青卫矛油绿繁茂的身姿。春天时,满树嫩绿浅黄的叶子既赏心悦目,又吸附尘埃净化空气,为绿化美化津城功不可没。尤其在北方萧瑟寒冷的冬季,它给人们带来难得的青绿和暖意。

而乔木冬青是冬青科冬青属植物,原产于我国江苏、安徽、浙江、江西、云南等南方省区。其树叶狭长椭圆,花朵紫红,果实赤红,秋冬季节开花结果。它喜欢温暖气候,但也很耐寒。因四季青翠,江浙一带称其为“冻青”。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记载:“冻青亦女贞别种也,山中时有之。但以叶微团而子赤者为冻青,叶长而子黑者为女贞。”寒冬之时,一簇簇红色的浆果挂满冬青树的枝条,形似红豆却比红豆大有质感,色如樱桃却比樱桃更红更沉静。严冬雪后,冬青果实更是红得亮眼,而且整个冬天即使树叶散落,它也不会掉下来,可为饥饿难挨的小鸟充饥饱腹,极尽生命的绚烂。因此,有人又称冬青之果为“女贞子”。

冬青树形优美,枝叶青翠,果实红艳,是城乡绿化和庭院观赏的好树种。近几年,冬青树从南方大量引种到天津,用于道路、公园、社区等环境绿化。冬青经济价值很高,叶、根、皮都可入药,叶子清热解毒,果实有祛风止血之效。冬青树木材坚韧,可制玩具、雕刻品、木梳等,树皮还可提取“挥发油”。



## 冬青卫矛与冬青

许新复

### ●拙墨短筒

#### 蜻蜓葡萄

胡西淳

葡萄跃架出墙头, 过往眸光暗自揪。 那日天公知吾意, 遣派蜻蜓来护秋。



### 崇高

徐悟理

自私自利者, 从不追求崇高的行为,是碌碌无为、浑浑噩噩、明哲保身、乏味油腻的小我者。

人为什么需要崇高的精神和高尚的行为,做个大我

呢?因为做大我对身心都有好处。做大我,追求崇高和崇高,看似是在帮助别人,其实最终的受益者是自己。它会让我们活得更有价值,更有存在感,更能被人接受和尊重。

们就饿不死。”

1976年以后,我们再也看不见父亲使用记账本记工分了。生产队解体了,而工分也立即失去作用。但父亲并没有马上把记账本遗弃,而是与时俱进地记录起分产到户后与自家有关的“正”字。

岁月更迭,流水人生。1993年冬天,72岁的父亲走完了辛苦勤劳的一生。“斗大的字不识半麻袋”的父亲,生前用工分和心血,把六儿二女养育成人,用这简单的一横一竖的“正”字,完成了一个庄稼人的“伟业”。

### 星期文库

“父亲二三事”之一

## 走心

连恒

走心,指用心,经心,放在心上。学习要走心,工作要走心,交朋友要走心,谈恋爱更要走心,似乎万事万物,若想和谐相处或马到成功,都需要走心。

人做事的质量高低,与是否走心有着直接关系。若是走心,必然心心念念一定要把事情做成做好;若不走心,便会拖拖拉拉得过且过,手在做事心在四处乱飞。走心的人做事让人放心,不走心的人做事让人担心,两者的区别不在于能力,而在于态度。

曾遇到一位走心的同

事,工作起来事无巨细保质保量,与人相处总是热情主动乐于助人。他对生活走心,所以收获了美好的生活,得到了满意的工作。与他交谈,常能感觉到他对一切都充满兴趣,再琐碎的事情、再别扭的人,他都能一视同仁真诚面对。问他原因,他说因为他对自己很走心。

原来,一切都是对自己的心负责。走心这个词,是与自己的心交谈交流,看清自己真实的心,明白自己想要什么,应该如何去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。所谓走心,其实是走进自己的心。

出门道:父亲书写时,走笔一定是很慢、很认真的。后来母亲告诉我,那是父亲出勤的“记账本”。父亲在生产队干一天活儿,回来就在本上画一个笔画。横竖横竖横,五天的活儿便组成了一个“正”字。就这样,一个“正”字又一个“正”字地延续下去,父亲一年的出勤天数像长长的红线绳一样,串起一串串“正”字。

终于有一天,父亲向我和哥哥说出原委。他一辈子不识字,生产队按分计酬,他怕生产队的记工员误记。所以一个月出勤多少个工日,必须当天记录下来。从那时起,我和大哥更加理解父亲“写日记”的良苦用心。他每

天在生产队起早贪黑地干活,就是想多赚几个工分,多赚几个钱,供子女们多读点书、多识点字,日后不用像他那样,当个“睁眼瞎”,记账还得费劲写“正”字。

后来大哥考上了中专,可他看到家里的日子过得实在紧巴,就主动辍学,到生产队干活儿,希望多挣几个工分,以缓解家里的困难。可没过几天,父亲便东借西凑攒够学费,硬是把大哥又送回学校。大哥一迈进学校大门,就“哇”的一声哭了,他是心疼父亲;而父亲也边流泪边对大哥说:“孩子,别哭,这不是又能上学了吗?好好读书!家里再难,你也别挂念。有爹在,你妈和你兄弟

## 记账本

百一夫

父亲的记账本,是用大哥写过的田字格纸缝钉在一起制成的。小时候,我一直对这个本很好奇:大字不识的父亲,怎么老是天天记“日记”?记得有一次,趁父亲上工不在家,我便偷偷从炕席底下翻出了父亲的“日记”给大哥看。我们“研究”半晌,也没发现啥“文采”,只是每页纸上都写满了长长一串“正”字。

那些成串的“正”字,虽然写得歪歪扭扭,但从一笔一画的态度上,倒是能看得

## 慧眼独具识良才

戴冠伟

史学大师钱穆读初中时参加地理考试,四道题共计100分,其中有一题是关于某山脉的。因为之前读过很多有关该山脉的资料,于是钱穆奋笔疾书,洋洋洒洒地开始答题。谁想,刚刚答完这道题,交卷的铃声响了。按常理,就算那道题他得满分也只有25分,可是拿到判完分数的卷子,钱穆惊讶地发现竟然得了75分。

原来,阅卷老师看他那道题答得论据充分,论证合理,且文笔清新,叙述流畅,一个中学生竟有这样的水平让他眼前一亮,于是不但给了出人意料75分,还写了一段长长的批语。这位老师便是后来成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之一的吕思勉。

新中国成立后被任命为北京第一刑庭庭长的谢邦敏,中学时偏科,尤喜文学,理科成绩总是垫底。毕业考试中,他发现物理试题几乎一道也不会做,索性交了白卷,还别出心裁地在试卷上填词一首,其中有一句为

“今朝纵是交白卷,柳絮原非理组人”。

给他判卷的老师叫魏荣爵,面对谢邦敏的白卷和词作,他虽有几分埋怨,但出于爱才之心,不仅没有上报,也没给零分,而是回赠了一首诗作评语:“卷虽白卷,词却好词。人各有志,给分六十。”后来,谢邦敏顺利拿到毕业证,考入西南联大法律系。

两则事例均已过去几十年,但如今仍能引发人们的深思。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魏荣爵先生认为:“考试不是衡量一个学生的绝对标准,人的本身才是目的,是尺度、是根本,其他的一切都是从属的、次要的。”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,他才做出了当年之举,也避免了栋梁之才的遗珠之憾。

当下,尽管人才发现、培养、成长的途径与手段,更加公平合理、通达畅行,但学习和借鉴先贤的眼光和胸怀,真正做到慧眼独具识良才,仍然是题中应有之义。